

沈从文 著

北京
出版社

野人献曝

——沈从文的文物世界



小
书



大 家 写 给 大 家 看 的 书

野人献曝

——沈从文的文物世界

沈从文 著 王风 编

北京出版社

小
书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野人献曝：沈从文的文物世界 / 沈从文著；王风编.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大家小书·第4辑)

ISBN 7-200-05772-X

I. 野… II. ①沈…②王… III. 文物—考古—文集 IV. K8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8189 号

· 大家小书 ·

野人献曝

——沈从文的文物世界

YEREN XIANPU

沈从文 著

王 风 编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 址：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市朝阳燕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32开本 9.25印张 150千字

2005年5月第1版 200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200-05772-X

K·620 定价：15.00元

质量投诉电话：010-58572393

序 言

袁行霈

“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时代，又何尝就小呢？

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使之不至于泯没。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它们重现光芒。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人文科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然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大家小书”出版在即，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以短小为宜。该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野人献曝》编辑余记

一

1960年，沈从文出版文物论文集《龙凤艺术》，在书的《题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近年来我写的东西实在太少，做的工作也不够多，这个小书能够出版，既欣喜且深深惭愧，真近于古人说的野人献曝，东西不足道，意思却还好……

按《列子·杨朱》：“昔者宋国有田夫，常衣缁赆，仅以过冬。暨春东作，自曝于日，不知天下之有广厦隩室，绵纁狐貉。顾谓其妻曰：‘负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献吾君，将有重赏。’”这就是“野人奏曝”或“野人献曝”的出处，《题记》引这个典故，原是自谦贡献微薄，却又出人意料地贴切。沈从文出身湘西凤凰县，据说还有西南少数民族的血统，按传统南



蛮的说法，更坐实是“野人”了。当然，《列子》中所谓“野人”，是与“国人”相对，也就是今天的“乡下人”之于“城里人”。沈从文一辈子总在文字上定义自己为“乡下人”，1979年10月20日给研究他的美国学者金介甫回信，其中专门答复了这个微妙处有点难以把握的名词：

湘西虽属湖南，因为地方比较偏僻，人口苗族占比例极大，过去一般接近省会的长沙、湘潭，以至于下游的常德人，常叫我们作“乡巴佬”……表示轻蔑，以为不讲礼貌，不懂得道理。但也包含一点恐惧，因为长沙人能言会说，一遇有什么不同意见，麻阳、凤凰人说不过他们，只有用拳头回答。照例打得“下江人”望风而逃……“下江人”，这是我们叫常德以下人的通称。如专指“长沙”人，则叫“沙脑壳”，或“叫雀儿”，也有看不起意思，前者是“不经碰撞”，后者为“只会叫嚷”，别无能耐。事实上是聪敏得多也能干得多的，任何事总是“乡巴佬”吃亏！

籍贯与出生地所在，对很多人而言是终生洗不去的身份。湘西是沈从文所依赖的“土地”意义上的故乡，

因而有他永远不认同也不被认同的“城里”对应着，当这种对应成为隔阂并上升为自觉时，他也就成了精神上的“乡下人”。在晚年不断提示研究者注意的《习作选集代序》中，有这样的自白：

我和你虽然共同住在一个都市里，有时居然还有机会同在一节火车上旅行，一张桌子上吃饭，可是说真话，你我原是两路人……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他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他对一切事照例十分认真，似乎太认真了，这认真处某一时就不免成为“傻头傻脑”。这乡下人又因为从小飘江湖，各处奔跑，挨饿，受寒，身体发育受了障碍，另外却发育了想象，而且储蓄了一点点人生经验。

这么一个“乡下人”，二十岁时直接越过“省城”，跑到“国都”，其后辗转于数座大城市，绝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北京。先是赤手空拳拼命写成了一个名小说家，接着遇到位于二十世纪中间点的那场天翻地覆，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是他一辈子遇到最



大一次“说不过他们”，而事实上不可能“用拳头回答”，这回“吃亏”的后果是他成为杰出的文史学者。

二

沈从文与文物的最早接触，按《从文自传》的说法，是十几岁在湘西一位“统领官身边作书记”时，登记其收藏的旧画古董。抗战时期在昆明西南联大，流连于工艺品之美，时时在地摊上检一点物廉价美的东西，大多是后来他经常提到并倾注心力的“花花朵朵、坛坛罐罐”。四十年代末，北京大学筹建博物馆，他自愿帮忙，那时已是颇具眼光了。但即便如此，五十年代转入中国历史博物馆后，他还是主动当了十年的“说明员”，这种艰苦的实物学习以及不为人知同样刻苦的文献披览，使他具备了罕见的综合文物研究的能力。

与他同时代的文物专家，约略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现代教育体制下科班出身的，也就是学考古的，当然他们有一整套的方法进行田野发掘并处理出土文物的科学鉴定和保管；另一类大多出身名门望族或古玩铺，名门之后和古玩铺伙计的身份差别自不可以道里计，但有同样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大量接触传世

文物的机会，因而练就出眼光。不过尽管他们也喜爱文物之美，但自觉或不自觉地都会受市场对文物价值定位的影响，日常物用不具“收藏”特性者通常不会关注。解放后，这些极具水平的专家进入各级博物馆，提升了各馆收藏水平，也带来各自的学术背景和观念习惯。

沈从文和他们不一样，现代的、传统的都没有经历过，他“转行”进入博物馆的人生大变动，也正像当年从湘西跑到北京，却仍然是个“乡下人”闯入“城里”，比如与那些在深院大宅和古董店练就眼力的书画鉴定家就有点格格不入。他“照例十分认真”地研究文物制度，并掌握了广泛的杂文物知识，尤其是衣着器物方面的全面了解，每每于定论有异样的看法，“对于字画时代鉴定，有的是专家‘权威’，我从来少发言权，只是从制度上提提而已”（《谈犖輿》），谦虚的发言姿态背后有压抑不住的自负，所以有时候很严厉，“我说的可能是‘专家’不注意的小问题，是常识，是客观事实”（《谈车乘》）。在他看来，“不仅是这些搞字画的专家‘权威’，对于一般文物常识少兴趣，即搞博物馆的同行中大专家‘权威’，看不起文物常识，不相信常识能解决问题、推翻迷信”（《用常识破传统迷信》），这也包括高校科研机构文史教员和研究员。“关键处就是‘专家



知识’有时没有‘常识辅导’，结果就走不通”，而有“知识”少“常识”的专家，凭的是书本和成见、经验和感觉，因为不了解或不愿下工夫去了解便看不起文物“常识”。他们的权威地位隔断了这些极具意义的“常识”对学术发展的作用，而沈从文的后半生就是锲而不舍地为“常识”的普及而奋斗，即使解放后的十八年间已“作过大小六十多次的检讨”（《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文革时的申诉材料仍在为“常识”争地位，下放干校，还是不放弃：

在极端孤寂简单的乡居中，用默记方式，试写文物常识小文，今天为止，已达二十篇，暂时告一结束……给人印象，若只是“毫无学术性，不过是些常识凑和”，那是完全十分对的。因为本来就“不学无术”，作了十多年说明员，对事物物稍微有点“常识”而已。（1971年7月1日）

这可真是“乡下人”“认真处某一时就不免成为‘傻头傻脑’”了。

三

沈从文在书画方面事实上只是余力为之，曾计划过的中国前期画史最终也没有成篇，只留下片段的看法，尽管他从服饰器物角度的考证并不能代替其他已有的方法，但确实自成体系，令人耳目一新，判断绘制时间上限尤其有效。不过这并非他的主要成就，他真正划时代的贡献是前人和他人用力甚少或者根本没有注意过的杂文物乃至“非文物”。以通常观点看，早先的沈从文是很不入流的，以自己的趣味买些大路货，看完了就到处送人，因为原本就不值钱，这与太太小姐去商店挑东西似乎没有什么大区别，喜欢而已。按他自己的说法，“‘玩票’资格也说不上”（《中国博物馆的研究工作》），但正是这种超越行业功利的广泛爱好使得他以特殊的眼光进入文物研究领域，他所主要关注的对象，“由于习惯上少文物价值，所以无人过问。既少文物经济价值，也不可能作伪。究竟有什么用处，还少专家学人注意过。考古工作者既未注意，一般谈工艺美术的又不知具体材料何在”（《螺甸工艺试探》），所以他会对那些堆积文物库房永远不会展出或出土后毫不引人注目的东西投以热情，在他看来，“货币价值既不高，很多又缺少文物



价值”的器物，“惟有能够把它当成古代物质发展史的地下材料看，才会觉得这里有丰富的内容，值得我们用一种新的态度来发现，来研究，来理解”（《我们从古漆器可学些什么》）。只有理解他的这种学术关怀，才能明白他的期望和选择：

对于年纪较轻、文史底子又较好的同行，则深深盼望其中还能有一小部分人，明白文物研究工作中范围实广，除了金石瓷玉、法书名画诸“热门”外，其实还有千百种至今还无人过问的“冷门”，大都还等待有心人，带点开荒辟地的雄心和勇气，采取个素朴客观热诚唯物态度，各就条件所许可，来分门别类，随时留心，进行些探讨工作，合力同功，能把这些研究中的空白点，逐渐加以填补。（《扇子应用进展前言》）

这些工作都是为未来他所称的“物质文化史”或“劳动文化史”、“生产发展史”打基础。文革期间下放回来后稍有工作条件，他就开始“分门别类”，设计各种小专题，从开始的十项、二十项到后来居然列出五六十项。就现在所知，光是他曾经提到的，就有绸缎、漆工艺、玉工艺、陶瓷加工、金属加工、前期山水画、图案、镜子、扇子、灯、屏风、家具、饮食

用具、地毯、纸、车辆、肩舆、船、兵器、马的应用和装备、马技和百戏、马球及其他球类、杂伎、舞乐、狮及狮子舞、熊经鸟伸、玻璃、琉璃等等，其中也有“金石瓷玉”，不过他的角度是工艺而非单纯器物鉴定。这些题目有些还曾有人注意过，但大部分从未有研究成果，“近于空白点”（《中国博物馆的研究工作》），而且一般不认为有什么价值，沈从文投入如此大的精力和热情，坚持当“‘打前站’的什长”、充先锋的廖化（1959年3月16日致沈云麓），明知道“事不可为而为之，后必有灾”的古训（1971年6月9日复史树青），明知道“这本是个‘举鼎绝踵’的工作，难于见好是意中事”，但他仍不免于做，希望“由少数知识分子手中产生的‘文史’和由万千劳动者手中产生的‘器物’，知兼爱并重使之打成一片，看成整体”（《中国漆器工艺》），这种坚持了整个后半生的剃头挑子一头热的精神，其迂阔处确实近于宋国田夫之“献曝”了。

四

这繁多而有趣的课题由于各种原因只留下一些片段，大部分只字未见，层出不穷的运动和应接不暇的人事问题始终冲抵着沈从文的勤奋与努力，他前半生



的文学事业被打断，而后半生的文物事业却在渐渐地消耗，那么多他可以做甚至只有他能做的课题，尽付不了了之，最终留下比较完整的工作成果也就《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项，这还得归功于周恩来的偶然提起和齐燕铭的举荐。虽然对沈从文来说，这只是他学问的一角，但巨著煌煌，也已聊可告慰了，这本著作实际上可看作其一生的学术总结，而在《前言》里，他不引人注目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这份工作和个人前半生搞的文学创作方法态度或仍有相通处……

在沈从文晚年，就他前后半生截然不同的际遇，亲属、朋友、研究者、爱好者等等每每议论乃至争论他的转行得失几何。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是大家都承认的，只是孰轻孰重见仁见智而已。由文学转到文物，有不得已的因素，自是终身之痛，八十年代他作品开禁以后，沈从文对出版旧作投入了相当的精力，但对自己的研究者，他在尽力配合提供方便之余，总要说那些东西已经烧了，已经过时了，不值得研究等等，这种语气的背后当然并非颓唐或灰心，更不是自谦，他清楚自己作品的价值以及正在行进的回归。不过话说回来，对于转行，以及由此取得的成

就，作出的贡献，也许他也有侥幸的感觉，在书信中，他表明自己并不羡慕“茅盾、巴金、老舍、冰心等”原先与自己有相似地位的作家享受着他所没有的各种待遇，而在政治运动中，又庆幸自己躲在历史博物馆，免去如他们那般被迫表态的尴尬。所以，与八十年代声明自己的小说、散文没有价值相反，他在不同场合甚至检讨中也一直认为自己选择转到文物界是正确的，这应该是出于他的本心：

……同时自然不免会感觉到，过去从事小说写作，工作态度即或还谨严认真，成就实在极其有限。现在搞的综合文物研究工作，对于在发展中的博物馆事业，对于文物研究中几个比较生疏薄弱环节的突破，以为文物研究中为生产服务的实践，可以尽的力，或许比过去写点小说，还来得比较扎实有用！（《中国博物馆的研究工作》）

那么，对于自己前半生的小说写作呢，同样在五十年代，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一些有历史影响但不符现实需求的作家出了一些选集，其中有《沈从文小说选集》，在《选集题记》中，他还是很顽强地表达了自己的文学理想：



我这个新从内地小城市来的乡下人，不免呆头呆脑，把“文学革命”看得死板板的，相信它一定会在将来能起良好作用……还应当有许多人，来从事这个新工作，用素朴单纯工作态度，作各种不同的努力……这么一个伟大艰巨工作，各自用上半个世纪时间，并不算太费！我既然预备从事写作，就抓住手中的笔，不问个人成败得失，牢牢守住“但知耕耘，不问收获”来做下去吧。

无论是文学还是文物，所谓“工作态度”，无非是“不问个人成败得失”，只问自己“可以尽的力”。至于方法，则基于不断的试验和努力，创作从标点符号学起，研究从当说明员干起，由此学习、探索、总结、发展……这是他前后半生工作的“或仍有相通处”。不过如果我们由此略略探究更意味的一些沈从文生命的底色，则有一个特别的文本《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一章自传——一点幻想的发展》，写于1949年初，末页自注“解放前最后一个文件”，这个“解放”不是“被解放”，而是“自我解放”，写作此文时他的精神已经不太正常了，不久就试图自杀，或者这篇文章可以算作他的“美学遗嘱”，其中有这样的内容：